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郭晨光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 承载着中古北方文学特有的观念和精神。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 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 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王言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奠定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 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 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 一是中古北方帝王亲撰王言; 二是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 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壮贞刚的文风, 并对南方王言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其修辞技巧的提高, 使得南方王言从原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渐摆脱出来, 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王言; 十六国; 北魏初期; 文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1-0188-11

西晋末叶, 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胡民族趁乱占据中原, 史称“五胡十六国”。从西晋灭亡(316)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 灭北凉重新统一北方。这些政权以淝水之战(383)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有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六国, 代国和冉魏不入十六国之列; 后期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大夏, 另有西燕不入十六国之列^[1]。这一时期在社会史上前后相连, 在文学史上也彼此联系, 从十六国到北魏初期形成的文学风貌一直延续至孝文帝改制。

与南朝不同, 十六国和北朝更重视应用文, 其中王言^①地位最高。蔡邕《独断》将其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戒书四种^[2],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主要有册书、制书、敕书、诏书、令书、玺书等几类。王言作为封建社会帝王的命令文书, 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来看, 其作为一种应用文, 文学价值略低。然而在北方却不然, 北人对此极为重视, 多数文坛名家、“大手笔”作家地

位的奠定都与王言撰制有关, 形成了措辞精炼得体, 文采与气势兼备的总体文风, 此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实乃奠定于十六国北魏初期。王言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 承载着北方特有的文学观念和精神。本文以王言为中心展开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演变研究, 梳理该时期王言的整体状况, 展现其兴起、嬗变的宏阔背景与内在逻辑, 从文章学角度弥补中古北方王言研究的缺失。

一、十六国王言的兴起及其特点

有关十六国时期的文学状况,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北史·文苑传》同)载:

既而中州版荡, 戎狄交侵, 僭伪相属, 士民涂炭, 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 挥翰于锋镝之下, 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畴, 知名于二赵; 宋谚(按:《北史》

收稿日期: 2023-06-28; 修回日期: 2023-1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成、流变及其学术体系建构研究”(21&ZD252)

作者简介: 郭晨光, 女, 河南许昌人, 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汉魏六朝文学, 联系邮箱: gcnku@126.com

作宋该，是)、封奕(按：《北史》作封弈，是)、朱彤、梁诰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3](743)}

在十六国近一百二十五年的历史中，北中国前后存续着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割据政权。这一时期北方地区文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地域与时期上的不平衡态势，尤其是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一方面，“八王之乱”、五胡入侵造成的浩劫，中断了西晋“人才实盛”的局面，除部分南渡士人，张华、裴頠、潘岳、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孙拯、嵇绍、嵇含、牵秀、曹摅、阮修、杜育、刘琨、卢湛等人皆死于非命，张载、张协、左思、潘尼等人皆居乡里。中原文学中心遭到破坏，洛阳等大城市的文学聚集和辐射作用被乡村的乌堡所阻隔，被称为“文章黜焉”“文章道尽”，以“体物缘情”为主要特征的诗赋创作不甚发达。另一方面，原属边鄙的朔方、河西地区由于局势相对稳定、统治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文教兼设”政策的实行，成为中原士人的避地之所，其文学发展呈现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同的样貌。特别是河西的五凉政权，前凉的开创者张轨自晋末就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经营河西，故有人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4](1150)}。陈寅恪进而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5]，即魏晋以来中原地区纯文学性质的诗赋传统被保留下来，如刘昞《酒泉颂》“清典”之评即指河西文风对魏晋清丽典则风格的继承。五言诗方面，前凉张骏《东门行》《薤露行》，后凉吕光《言志诗》(亡)，北凉胡叟《示程伯达诗》等也是沿袭魏晋诗风的作品。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文学状况的另一重要态势即王言作为主流文体开始兴起，“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学样式。严可均据《晋书》《魏书》及明屠乔孙等辑的《十六国春秋》，共辑出 322 篇，按文体列表如下：

表 1 十六国应用文体一览表

文体	王言	章奏表启	书信	经序经记
数量	110	93	48	40
经论等论文	戒子书	檄文	符命	
15	4	8	4	

可见，王言所占比重超十六国散文总量的 30%，其中诏 68 篇，令 35 篇，敕 4 篇，命、谕各 1 篇。其实当时各民族首领的王言数量远多于此，但由于十六国被后代认为是“偏霸”“僭伪”政权，各民族首领的“下诏”在《晋书》等史书中被史官用“春秋笔法”改为“下书”“令”等文体，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王言的原始数量和面貌^[6]。所谓“章奏符檄”乃是以民族首领王言为代表的施用于政治领域的各类文章的总称。相对于大量诗赋文献散乱无归或埋没草莱(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诗歌含残篇仅 35 首)，王言因其实用性和时效性服务于战争和政治，能够在战乱纷繁中保存下来，本身就说明了其社会认可度、接受度较高，能够被统治者和世人所重视。此外，这一时期的王言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就王言的撰制者来说，既有五胡民族的首领，又有其身边代替发号施令的汉族文士。宋叶适云：“刘、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国，虽族类不同，而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原不甚异；独拓跋以真匈奴入据诸夏，纯用胡俗强变华人。”^[7]五胡的核心族群并非远徙而来的入塞部族，而是在汉晋时期就已居住在华北、太行山两侧，涵化于中原士人之中的群体，其文化水平、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已经很大程度上中原化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僭伪诸君有文学”条专论刘渊、刘聪、刘曜、慕容皝、慕容儁、苻坚、苻登、姚兴、姚泓、李流、李庠、沮渠蒙逊、赫连勃勃等首领的文学素养^{[8](164-165)}。其中氐族是汉化水平较高的一支，姚薇元称：“氐族固久通中国，以与汉族杂居，渐趋融合，姓汉姓，习汉语，并精通汉人之生产技术与礼俗文字。”^[9]如《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引车频《秦书》有“(苻)坚亲为敕文”^{[10](4194)}的记载，其写给昔日的爱侣、臣子的《诏慕容冲》，应为亲作。其余像前燕慕容儁《手令敕常炜》、前凉张骏《遗令》、南凉秃发

利鹿孤《遗令》、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等手诏或手令,施用于军情紧急或赐予重臣亲信,也应为民族首领亲撰。

更多情况下,王言的实际撰制者可能是《周书》等史书列举的士人,其身份是参管机密并代民族首领发号施令的文书之士。五胡民族自立国之日起,就模拟魏晋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仍以中书省执掌王言和参与撰史为主要职责,由中书令、监亲领,中书侍郎、舍人等共同参与、协商^②,如后赵中书令徐光、王波,前燕中书令韩恒、中书监宋该,后秦中书令韦华、中书监王周、中书侍郎王尚,大夏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可能就是王言代拟者。这些士人凭借着博文丽藻入职,如前燕封奕、宋该“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11](2806)},后秦给事黄门侍郎古成洗、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11](2979)}。前秦王猛被拜为中书令,也是苻坚认为其“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10](588)}。严可均据《资治通鉴》卷一〇三“简文帝咸安元年”所载“(苻坚)因命王猛为书谕天锡曰”^{[12](3295)},将《为书谕张天锡》置于王猛名下。

这些王言代拟者的另一重身份是统治者身边的文学侍从,也需具备相当的诗赋之才,类似于汉魏之际祢衡、陈琳、阮瑀这样能够兼善诗赋创作的“书记型文人”。据曹道衡《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一文考证,《周书》等史书所载徐光、宋该、封奕、朱彤等人作品不存,但曾作诗赋或有时人称赏的记载^[13]。后赵中书令王波曾作《玄玺颂》(亡)、中书侍郎王度还存《扇上铭》(残)。出现在吐鲁番高昌郡时代的上揭《前秦拟古诗》残本(Dx.11414+Dx.02947)保存了前秦文学的珍贵样本,是苻坚殿前中书侍郎朱彤、韦谭、阙名秘书郎模仿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而作的五言诗^[14],应是群臣举行的一次文学聚会的集体作品。这些纯文学性质的诗赋在战事稍缓、政权相对稳定之时“往往而出”。可见乱世之中的风骚传统并未完全消歇,只是退居到从属地位。

其二,由于各政权封建化水平、统治者汉文化修养不一,各地王言文风也存有较大差距。如羯族是五胡之中地位最低者,其文化背景、人情风俗与其他民族差异较大。“赭羯之人,其性猛

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15],保留着早期游牧民族勇烈嗜杀的习性。后赵的开创者羯族人石勒曾占据长安、洛阳二京,短暂统一过北方。但其目不识丁,早年曾有被贩卖为耕奴的经历。其现存的15篇王言中,最长的《下书拒石虎等拒上尊号》仅有82个字,其余像《获黑兔下令》《下书采律令之要》《下书国人》只有短短一句,是为解决具体事务而颁行的短期律令,较少有文采的修饰和辞藻的点缀。

对于前赵、前燕等占据过中原、汉化水平较高的政权而言,王言的艺术特色则呈现出向魏晋复归的倾向。

一方面,王言结构模式呈现出日趋定型化、固定化的特征。魏晋王言结构上大体可分为篇首、篇中和结尾三部分,篇首较少引用先圣格言或前代先例(“冒头”),而是直接进入主题或具体内容,即后人总结的“篇首欲包含一篇大旨,贵乎明而紧。篇中曲折周密,铺陈详尽,引用饱满。篇尾欲点缀丁宁,发送轻快”^[16]。这种固定结构亦被前赵、前燕等政权所继承,将晋武帝司马炎《下傅玄皇甫陶诏》与前赵刘曜《下书封乔豫和苞》、前燕慕容皝《下令赐封裕》为例相对照(见表2),就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前赵、前燕等政权王言呈现出以散体为主,追求句式整饰,对偶骈俪精工的特征。总体而言,十六国王言的偶句相对魏晋来说比重大为降低,且多为宽对、流水对,并不过分追求工整。不过,由于王言的目的和传播对象指向天下臣民,诉诸口耳,读来朗朗上口才能取得理想效果,因此出于功效而讲究文采,在关键位置偶然加入一些骈句以便宣读。如《下令赐封裕》“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穀为命”^{[11](2689)},使用骈体句式中的“6:6”式;再如“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减也。待克平凶丑,徐更议之”,大量使用“四字格”修辞方式,中间穿插六字格,形成两组“4; 4; 4; 6”的排比句,节奏明朗,长短结合,使其整齐而不雷同,匀称而不呆板。同时,注重将紧句和松句穿插使用,如衔接“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诗》不云乎:‘无言不

酬’”，后者化用《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过”及引《诗》论证，展现对经典的熟稔，行文中充满君主对臣子的感慨、感激之情。此外，《下令赐封裕》篇幅容量远大于《下书封乔豫和苞》，使用多种修辞手法，篇章结构更加整饰规范。王言的艺术水平不仅取决于代拟文士的文学修养、水准，还需适应当地民众的文化水准和理解能力，使其起到“敷告天下、咸使闻之”效果。某些王言需经过层层传抄发送，甚至在乡里向百姓宣示，正如曹道衡所言：“前后燕的文学水准较高，这时河朔地区已成了北方的文化中心。”^[17]王言写作水准的提升，也反映着当地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

表2 司马炎、刘曜、慕容皝王言对照表

	司马炎：“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 ^{[11](1320)}
篇首	刘曜：“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11](2689)}
	慕容皝：“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 ^{[11](2825)}
	司马炎：“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 ^{[11](1320)}
	刘曜：“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 ^{[11](2689)}
	司马炎：“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 ^{[11](1320)}
	慕容皝：“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 ^{[11](2825)}
篇中	刘曜：“《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 ^{[11](2689)}
	慕容皝：“《诗》不云乎：‘无言不酬’。” ^{[11](2825)}
	司马炎：“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 ^{[11](1320)}
	刘曜：“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 ^{[11](2689)}
	司马炎：“出付外者，宁纵刻峻是信邪？故複因此喻意。” ^{[11](1320)}
结尾	刘曜：“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 ^{[11](2689)}
	慕容皝：“宣示内外，有欲陈孤之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 ^{[11](2689)}

以上是十六国王言的文学特质，其属于中古北方王言的初创阶段，某些语句照搬得生硬，尚

未融化自然，不如魏晋王言奇丽典雅。不过，在战争、宣传过程中，以质朴茂实的语言极大方便了军民理解，提升了王言发挥的政治和传播效果。

二、北魏初期王言的嬗变及其文风的确立

北魏建立之初，北方尚处于十六国阶段，文学气象、文化气质与十六国一脉相承。作为民族政权，北魏与十六国又有诸多不同。拓跋鲜卑久居塞北，“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4](1)}。因习俗异于中土，语言需要翻译，统治者对中原的礼仪文化不感兴趣，如贺狄干在后秦习读书、史，精通《论语》《尚书》，举止风流，有似儒者。返国后，太祖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4](686)}。《魏书·崔浩传》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汉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4](811)}上述的“以胡变华”是为了防止汉化而采取保守的文化政策。学界对北魏初期文学的评价甚至还要低于十六国，如认为“诗赋创作确实呈现出一种真正彻底的萧条”^[18]，“在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发动改制之前，北朝的汉文学，是称不上正常的存在与发展的”^[19]，等等。若一味强调诗、赋、铭、颂等言情见志之作，那么必然得出本阶段文学荒漠化印象。倘若我们转变研究视角，以王言作为角度切入，那么北魏初期的文学样貌亦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之态。王言在继承十六国文风基础上又有所嬗变，同时，其在北方的地位也得以完全确立下来。《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北史·文苑传》同）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状况：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浩（《北史》作“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3](744)}

具体而言：其一，北魏继承并发扬十六国重视王言的传统，其发展骤然呈现井喷之势，展现

出极度繁盛的态势。王言使用频率之高、写作数量之多,均远超前代。就使用频率而言,《魏书》中引用或提到王言多达两千余次,超过前四史的总和。其中太祖拓跋珪卷38次、太宗拓跋嗣卷42次、世祖拓跋焘两卷98次、高祖拓跋宏两卷多达248次,其他志、传还提及其诏、敕等180余次。多个“诏”字意味着一份诏令录入史册,其中一些诏书事情寻常,内容多元,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之高,甚至被《史通》讥为“秘累”。就写作数量而言,有研究者统计,自天兴元年(398)北魏定都平城至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近百年间,王言是平城文学中所占数量最多的文体,约为94%^[20]。此外,《隋书·经籍志》别集类收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亡)。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及许敬宗《文馆词林》、朱祖延《北魏佚书考》、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等书收录,孝文帝现存作品以王言为主,占据了总量的80%以上,《魏书》本纪称其“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4](187)}。作为诗赋名家的高允,《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现存诗赋也只有寥寥数首。《魏书·高闾传》称其“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有余篇,集为三十卷”(《北史》作“四十卷”),可见北人文章、文集的共同点在于王言及其他应用文占压倒性比重,造成这种情况并非因为“北方史书倾向于收录散文类作品,但不倾向收录诗歌而造成的亡佚”^[21],而是此类作品北人确实创作较少的缘故,如“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4](1242)}。相对南方文士赋集、诗集动辄几十卷、上百卷,郑道昭所作当世已经算是比较多的。

其二,就王言撰制者的身份而言,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等几位魏初帝王,基本不具备亲作的能力,王言撰制需完全委任身边的御用文士。“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这一串名单记录了从昭成帝到孝文帝前期的王言代拟者,反映出代拟这一行为在北魏初期已经趋于例行化、制度化。如许谦“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4](610)};崔宏于道武帝时“自非朝廷文

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4](623)};崔浩于太武帝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4](812)};高允自文成帝至献文帝,“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4](1086)};高闾于孝文帝太和十年前,“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4](1198)}。道武帝时还有邓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4](635)},严可均据此将邓渊之名补入《全后魏文》拓跋珪文中。像天兴年间《定国号为魏诏》《天命诏》《官号诏》《即位告祭天地祝文》等开国文书就可能出自邓渊之手。王言委于“专人之手”,促使代拟者身份的独立,较高的身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著作的署名权,代表魏初王言最高水平的《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就被史书明确归于崔浩名下。“声实俱茂”指面对统治者猜忌和防范,汉族士人凭借其王言(而非诗赋)获得恩宠,声望日高。凉州士人入魏后被冷落的境遇或可提供一个反面例证。张湛、宗钦、胡叟、胡方回、段承根等擅长诗赋,其文学造诣较崔浩、高允等河北士人成熟,但似乎只有胡方回曾制掌丝纶的经历被拓跋焘雅重,“召为中书侍郎,赐爵临泾子”^{[4](1149)}。

这类士人不同于十六国诗赋与王言兼善的“书记型文人”,而是完全沦为王言的拟代者,类似于魏晋时期孙资、刘放、卢志一般只擅长文书写作而并未留下具备诗赋之才记录的士人。究其原因,魏初对崔逞、崔浩、邓渊等汉族文士血腥的杀戮,一人获罪而远近皆诛造成高门慎讥畏祸、谨慎内敛的心态,是导致其文体选择由诗赋完全转向王言的主要因素。如崔宏“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4](623)};崔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4](812)},张湛“每岁赠(崔)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4](1154)};受崔浩案牵连,高允《征士赋》自叹“不为文二十余年矣”^{[4](744)},不仅是其个人选择,也代表了北方士人的普遍心态。

其三,有关北魏初期的王言文风,《周书》等史书总结为“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永嘉是晋怀帝司马炽(307—312)年号,认为继承的是西晋王言文雅典正的风格。由于令狐德棻、李

延寿等初唐史官建构文统时秉持重北轻南的文化态度^[22]，对北方文风多有溢美之词。实际上，由于拓跋鲜卑汉文化水准较低，北魏初期王言文风呈现出更加质朴少文的面貌。不仅远逊于西晋，甚至也落后于十六国其他民族政权。如天兴元年(398)《定国号为魏诏》：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以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4](32-33)}

这是北魏颁布定国号的开国诏书，这种下行全境、昭告他国的王言，理应写得典雅隆重，然而全文主体仅四句且全用短句，少有对偶、用典，显得平实洗炼，与当时其他军国文书没有明显区别。还如明元帝拓跋嗣褒奖大臣王洛儿的《诏赐王洛儿爵》，相对于前赵、前燕典丽整饰的文法，充斥着“王洛儿”“洛儿等”“不然”等大量的口语，不够庄重得体，也没有骈句和对偶，只有一些简单的先圣格言，如“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4](799)}”等。这种情况持续至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已近五十年，风格一如既往，没有较大改观，如其写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两封书信，纯属口语，几同谩骂。曹道衡认为可能更接近于北魏朝廷中通用文体的原貌^[17]。似乎只有向北凉彰显正统意图的《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可称得上“永嘉之遗烈”。

如果说这种朴拙的文风是受限于魏初的文学水准，那么这种情况在以“爱尚文学”著称的孝文帝执政后，已然演变成为北方所追求的一种审美倾向。如太和八年(484)孝文帝《令官民各上便宜诏》要求“务令辞无繁华，理从简实”^{[4](154)}，清徐乾学称“省繁文，崇简实”，尤得求治之要”^{[23](220)}，认为此种文风符合北方的治国需求，根植于北方本土文风尚实、敏速等特点。孝文帝自作王言即具备这两种特征，如《复南七州常调诏》被清康熙皇帝评为“语朴而挚”^{[23](220)}。其代表作如《诏答彭城王勰》《手诏征王肃入朝》《手诏皇太子》，都是不超过五句的简洁文字，行文中亦不乏对臣子、亲属的真情流露。此种文风亦

被北方历代统治者所强调，如北齐高洋《正风俗诏》《王昕削爵诏》以及北周宇文泰奏行“大诰体”，都是对浮华文风的直接干预，提倡语言省净、义理明晰，保持北方本土文学贞刚质朴的文风，才能抵抗南方文风的不断侵袭。

三、王言成为中古北方文学“第一义”之缘由

从十六国到北魏初期，代拟者身份逐渐清晰，文书制度、王言文风开始定型，王言成为北朝各类应用文中“第一体”。其中原因，固然有战乱频繁的现实以及北人尚实用的传统，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以服务于争夺正统之目的。集权制度下以天子名义颁布的诏令，旨在体现大一统政权在世界秩序的中心位置，如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遗匈奴书》和成帝《报乌珠留鞬禅于诏》，用于大一统的中央政府与宾服以外那些被松散控制或完全独立的蛮夷戎狄之间。这样理想的外交关系，是天子统治在空间层面的设想与体现。在割据政权并立的多元中心，统治者追求的目标都是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天下政令的统一，如苻坚全盛之时，王言的传达“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11](2895)}，仿照汉代“十里一亭”的规定，以“文书御天下”^{[24](591)}。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文书成为君主彰显“唯我独尊”天子地位的手段，时人在王言文体的选择、使用上有着明晰的意识，例如：

李寿将李宏自晋奔于季龙，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季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中书监王波议曰：“……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消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11](2770)}

李宏既至蜀汉，李寿欲夸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楛矢”(“下令”在《资治通鉴》卷九六《晋纪十八》作“下诏”)，季龙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11](2672)}

面对非君臣关系，石虎使用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而非制诏，以避免引起争端。然而对方却借此夸耀，公然称其为“羯使”，而且使用了等级

更高的“诏”。还有：

(苻)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称诏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间。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慕容)冲命詹事答之，亦称“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11](2923)}

苻坚自称“朕”“诏”，慕容冲作为其昔日之臣子、爱侣，不念旧情，依旧使用等级更低的“孤”“令”以示礼节。

魏初将“诏”“令”文体使用规则完全固定下来，与十六国和南朝帝王大量使用“令”相比，北魏“令”似乎仅存于皇太后、太子和权臣名下。魏昭成帝时还存有少数几则令文，自拓跋珪建国开始，北魏帝王使用的下行文体似乎只有诏、制、敕、册、玺书，唯独缺乏“令”。究其原因，“诏”作为君主对臣下发号施令的标志，《文心雕龙》专列“诏策”篇，是君主尊严的确定与展现。“令”也有发布命令的功用，但文体上没有“诏”尊崇。《说文解字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25]“令”在《文心雕龙》只附于《书记》，归于各类政务使用的杂文。除皇帝外，皇太后、皇后、太子及权臣均可使用，如北魏胡灵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4](337-338)}。《魏书》以历代帝王之“诏”串联全书，孝文帝“绍晋定德”，不承认前后赵、秦和二燕，因此魏收仅对苻坚伐晋的命令文体称作“令”^{[4](2103)}。可见北方士人对“诏”“令”文体的选择有些清晰可辨的缘由。

北魏统一北方后以占据中原的绝对优势，贬南朝为远逃江会、不闻华土的僭伪政权。拓跋焘首先通过王言表达与代表礼乐文明的南朝分庭抗礼的意愿，如元嘉二十七年(450)的宋魏战争，双方于彭城城下的对话、馈赠即可证明。拓跋焘遣使李孝伯与张畅谈判，《魏书》载李孝伯对张畅称“主上有诏”，张畅反诘魏主之诏只能用于北境，而非邻国之臣。没想到李孝伯却借此夸耀，“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4](1168-1169)}(《宋书·张畅传》将此语删去)。当时拓跋焘已无心南下，希望通过货物交换达到

讲和目的，三次用“诏”(《宋书·张畅传》将后两次“诏”字删去，改作口语“云”)送给对方骆驼、骡、马、葡萄酒以及盐、毡、胡豉等杂物。李孝伯在“后诏”中转达拓跋焘希望刘义恭派遣使者——“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4](1170)}(《宋书·张畅传》将“朕”悉数改作“我”)。作为北方的新霸主，拓跋焘是如此急切地想向南方展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三次用“诏”未免显得生硬、笨拙，但通过王言彰显自身是正朔所在却是所有北方统治者共有的心态。从另一角度说，《宋书》等南方史书将“诏”“朕”等帝王专属文体、用语或删或改，说明南方政权对其中展现的正统意识也颇为忌惮，试图以己方立场贬斥对方。

此外，我们还可从北方帝王对“檄”的使用来给予侧面证明。檄作为一种军事战争中承担宣传性和应急色彩的应用文体，其性质与“诏”“令”等王言相近，因而《文心雕龙》将“诏策”与“檄移”置于相邻的两篇。南方帝王如东晋元帝《讨石勒檄》、康帝《讨石虎檄文》等时常使用檄文来发布北伐、西讨命令。据现存文献，北方檄文数量不多且全部以臣子口吻发布。如北魏慕容绍宗《檄梁文》，北齐杜弼《檄梁文》(《艺文类聚》卷五八作魏收)、卢思道《为北齐檄陈文》，北周申徽《为周文帝传檄方镇》等，隋炀帝杨广作为晋王征讨陈朝曾作《遗陈尚书江总檄》《诈为蜀王秀檄文》，然登祚之后没作过一篇。究其原因，王言作为帝王独享的下行命令文体比檄这种施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平行文体更能彰显正统地位，以及自身在文化象征层面的威望。在血缘、文化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王言必然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大效用，必然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

四、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上文对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进行了细致分析，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承载着北方社会特有的文学观念和精神，此种文学传统实乃奠定

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深度参与着中古北方文学的建构，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中古北方帝王形成了亲撰王言的传统。从十六国和北魏开始，西魏、北齐、东魏、北周一直到隋代，几乎每个帝王都有此类文章。北魏献文帝和孝文帝父子“诏令殷勤”^{[4](1383)}，孝文帝“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4](187)}。

《文馆词林》弘仁本收录北魏文成帝、孝文帝、孝静帝，北齐文宣帝、武成帝、后主以及北周武帝、明帝八位帝王的诏敕 27 篇^[26]。帝王亲撰凸显对王言的重视程度，将其作为最高层次的文学对待。相比“汉帝多自作诏”^{[8](86-87)}，北方帝王亲撰王言之目的依然在于展现优越文化，服务于南北正朔之争。这在“口占”的使用上尤为明显。十六国战乱频繁需快速处理军务，民族首领多“不修书传”，使王言有了口头述说的可能性。如大夏赫连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刘)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11](3208)}，口占到炫耀才华的效果。《晋书》同卷又载赫连勃勃自言(《通鉴》作“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11](3205)}同条在《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居处部》引《十六国春秋·夏录》作勃勃“下书”，多出“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义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远，宜有美名”^{[10](927)}。前者应属口占，后经文士润色，以写定在册的面貌呈现。拓跋焘写给宋文帝的两封质朴如口语的书信，曹道衡推测可能是太武帝口授，由掌管文书的人直接用汉字写成^[27]。

自孝文帝开始，帝王口占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魏书》本纪载其“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4](187)}，就是口占。文明太后之丧，孝文帝与游明根、高闾、李彪、东阳王丕十四往复，《魏书·礼志三》皆作“高祖曰”，严可均认为“皆似面语”^[28]，只据《通典》收录其《诏答东阳王丕等》《诏游明根高闾等》《诏李彪等》三首，其实都是口占。还有北周明帝《大渐诏》，《周书》本纪载“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渐，诏云云”^{[3](59)}，严可均认为“其诏即帝口授也”^[29]，被毒杀前口

授诏书传位宇文邕，而让权臣宇文护无法违逆，口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威力。全文篇幅长达七百字，是其真情流露的优美散文，可见北朝后期帝王已经具备极高的文学水准。

其次，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与南方不同，北方文士大多有在中书机构或地方机构、王府、幕府中“掌诏诰”“掌书记”的经历。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北魏开始仿效魏晋门阀制度，拉拢北方的门阀大族以维护统治。拓跋焘在神䴥四年(431)征召北方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渤海高氏、西河宋氏、京兆杜氏、太原张氏等进入政坛，其中卢玄、崔绰、李灵、邢颖、高允、游雅、张伟等“皆拜中书博士”。中书省成为北朝汉族文官的中心由此得以确立，其权力基本限于“掌诏诰”和修史。此职在鲜卑集团中不受重视，但中书监、令，中书侍郎、舍人、给事黄门侍郎、给事中等成为汉族士人竞相争夺的“热官”^[30]，是其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预示着北朝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中古北方几部史书“文学/文苑传”描绘了王言发展的文学脉络。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载孝文帝之后，“袁翻才称澹雅，常景思操沉郁”^{[3](744)}。《魏书》载孝昌中，袁翻任中书令，与中书舍人徐纥“并掌文翰”^{[4](1534)}；延昌初，常景受诏撰《门下诏书》，“以文义见宗，著美当代”^{[4](1808)}。《北齐书》一个显著特点，即是撰制王言的中书官员归于《文苑传》。如天保中，李愔、陆邛、崔瞻、陆元规“并在中书，参掌纶诰”；河清、天统年间，杜台卿、刘逖、魏骞等中书官员“亦参知诰敕”，“其关涉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之作”。魏收于武平年间去世后，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等出任中书侍郎，“诸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俱是德林之笔，道衡诸人皆不预也”^{[31](603)}。此外，《文苑传》明载为中书侍郎的尚有邢邵、荀士逊、韦道儒等，足见中书侍郎一职在北齐几乎成为文采的代名词，而在同任此职的官员中，又会根据文采高下来分配不同内容、文体的王言。北周情况与北齐类似，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等成长于北魏时期，入关以后掌文书于中书省或相府之中，“咸奋鳞翼，自致青紫”^{[3](744)}。其中苏绰是权相宇文

泰“大诰体”的发起人。北周自齐亡以后，全盘吸纳了北齐中央文枢的成员，如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德林、中书侍郎薛道衡、中书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等十八人被征入长安，这些“大手笔”被周武帝宇文邕视若宝贵的政治财富。入隋以后，他们依然以其特长活跃在政坛、文坛之中，如李德林“文诰之美，当时无二。君臣体合，自致青云”^{[32](1367)}；薛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声名籍甚，无竞一时”^{[32](1584)}。这种独特的文学观贯穿于北朝始终，彰显与南朝文学的显著差异。

最后，以王言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不是简单向南方靠拢、因袭，而是能做出新的贡献。自古王言就有威严与温厚相结合的文风特点^[33]。西汉王言确立了以典雅为主的风格范式^{[34](359)}。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文书，是朝廷文雅的体现。如崔浩《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就有向北凉彰显正统文化的意图。基于这样的题材，文笔就必须典正，行文必须简洁明晰。此外，各政权还不约而同地追求有别于典雅的另一种风格——宏壮。这是由于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无论是北方各民族之间，还是与南方晋、宋等政权在正统争夺上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晋室自南渡之后，便不曾放弃北伐，东晋、宋、齐、梁各朝的北伐诏、西讨诏及各类檄文层出不穷。如桓温《檄胡文》，被刘勰评为“观衅尤切”，是“壮笔”^{[34](378)}。前凉国主张骏《上疏请讨石虎李期》和张重华《上疏请伐秦》都是气势磅礴讨伐的奏疏。前者能进入南方文人刘勰的视野，称其“文质耿介”，为“陈事之美表”^{[34](407)}，是因为前凉一直奉晋为正朔，并一直积极与东晋联系。

发挥王言“昭王制，肃强侯”^[35]的效用，是北方士人在撰制上尤为看重的方面，这也促成了北方王言宏壮风格的形成。所谓“宏壮”，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称“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36](1381)}，即气势恢宏、贞刚凌厉的特征。如慕容宝入侵时，援将杨佛嵩行军缓慢，拓跋珪命许谦作《遗杨佛嵩书》，杨佛嵩阅后“乃倍道兼行”^{[4](611)}；张袞“遗(慕容)宝书，喻以成败。宝见书大惧，遂奔和龙”^{[4](613)}。两者

语言明白晓畅，文采阙如，重在发挥文章却敌的实用功效。魏初王言大体保持着类似的风格，如拓跋焘亲征北凉之前，诏公卿作《为太武帝让沮渠牧犍书》，以整齐的四言对句历数牧犍“十二宗罪”。如其三“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取两端之荣，邀不二之宠”；其七“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浑，提挈为奸”，节奏明朗、简明有力。其后提出上中下三策，下策“如其守迷穷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4](2207)}，以四言散句叙述，具有强烈的威慑意味。四字句为主的句式与雄壮的词气相结合，呈现出一种苍劲贞壮的风格。还有拓跋焘《诏高车使者慕容坦》“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4](2311)}。这些文书的实际作者应是以崔浩、高允为代表的士人，刘师培《南北文风不同论》一文称崔浩、高允之文“咸确自雄”^{[37](561)}，即不追求辞藻华美、气势逼人的战斗文风。

此种宏壮贞刚的文风一直延续至北朝后期，如北齐邢邵“永安初，累迁中书侍郎，所作诏诰，文体宏丽”^{[31](476)}，即在宏壮基础上个人文采的加入。文宣帝高洋曾游东山，敕魏收作诏，宣扬威德，魏收“词理宏壮”^{[31](490)}。《文馆词林》收录魏收《北齐文宣帝征长安诏》，以四字句结合雄壮的词气，颇有宏壮之美。高洋所谓魏收文书词气胜过温子升、邢邵，实非虚语。作为北周和隋代两朝大手笔的李德林，被人称为“已大见其大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比来所见后生制作，乃涓涔之流耳”^{[32](1352)}。北方王言始终保有一份昂扬自信和强势态度，而与南方梁元帝《耕种令》“直似士女游春小简，官样文章而佻浮失体”^{[38](2174)}迥然有别。

更重要的是，在北方王言的压力和影响下，南方从齐梁时期开始，一反刘宋以前多以寒庶、恩幸士人担任文书、侍从之士，王融、刘绘、谢朓、江淹等高门士族、诗赋名家开始参与王言撰制。陈代王言开始进入帝王评赏的范围，如“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陈后主以帝王之尊，亲自撰写王言并令姚察“刊定”，足见其对文辞要求之高。在其影响下，陈朝的文坛宗主多是王言大手笔，如《陈书·徐陵传》载：“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

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39]⁽³⁷⁹⁾徐陵以绮艳诗风著名，但在当时成为“一代文宗”，是因其禅授诏策、九锡文等王言撰制上取得的文学成就。这一过程不仅使文书之士逐渐获得了精英士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王言修辞技巧的提高，也使得南方王言从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注释：

- ① 本文不以“诏令”作为标题，一是考虑到与“王言”相较，后者更全面；二是“王言”作为制度和文学研究用语，已经为学界所公认。
- ② 有关十六国和北朝的三省制度，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中西书局 2018 年版）的研究观点可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II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923.
- [2] 蔡邕. 独断[M]. 四库全书：第 850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74.
- [3]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 [4]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
- [6] 郭晨光. 从“下诏”到“下书”——十六国春秋等史书的春秋笔法[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43-149.
- [7]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68.
- [8] 赵翼. 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M]. 王树民，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 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修订本[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32.
- [10]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1]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胡三省，音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3] 曹道衡. 曹道衡文集：卷一：中古文学史论文集[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328-392.
- [14] 徐俊. 俄藏 Dx.11414+Dx.02947 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时代[C]//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6.
- [15] 玄奘. 大唐西域记译注[M]. 辩机，编次. 芮传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9：688.
- [16] 杜浚. 杜式文谱[C]// 历代文话：第三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449.
- [17] 曹道衡. 曹道衡文集：卷五：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451.
- [18] 吴先宁. 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61.
- [19] 钱志熙.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6.
- [20] 柏俊才. 文化视阈下的北魏文学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23.
- [21] 孙康宜，宇文所安.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 年之前[M]. 刘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314.
- [22] 王文进. 南朝山水与长城想象[M]. 台北：里仁书局，2008：298.
- [23] 章建文. 御选古文渊鉴评注辑校[M]. 合肥：黄山书社，2022.
- [24]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5]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57.
- [26] 林家骊，邓成林.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7] 曹道衡. 曹道衡文集：卷六：南北朝文学史[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389.
- [28] 严可均. 全后魏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
- [29] 严可均. 全北齐文 全后周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4.
- [30]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90.
- [31]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32] 魏徵.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9.
- [33] 杨雨，赵鹿园. 徽宗朝丰亨豫大的政治理想与月令的文体新变[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4-32.
- [34] 范文澜. 文心雕龙[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5] 姚鼐. 古文辞类纂[M]. 黄鸣，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22：12.
- [36] 遍照金刚.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 卢盛江，校考.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7] 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38] 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39]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21.

Wang Y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ixteen States and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orthern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GUO Chengu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literary style, Wang Yan (mainly referring to the King's words) carries the unique concepts and spirit of the medieval northern literature of China. Wang Yan,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emperor, became the sharp weapon for the northern regime to fight for legitimacy. And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in the national politics, it became the literary style with the highest social status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value in the north. As a literary tradition and a systemized writing style, Wang Ya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ontinuing through the Northern Dynasty on to the Sui Dynasty, and finally forming long-lasting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there were some literary traditions formed from Wang Yan. The first is that the northern emperors formed the tradition of writing imperial edicts in person. The second is that it influenced the northern literati's status and official careers. And third, the magnificent northern Wang Yan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outhern Wang Ya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hetorical skills of the southern Wang Yan which made the southern Wang Yan break through its original role a political tool and hold its own unique aesthetic value.

Key Words: Wang Yan; the Sixteen States;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literary tradition

[编辑: 陈一奔]

(上接第 37 页)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risks and ethical governance of ChatGPT application

ZHOU Jin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achievement with intensively creative AI features, ChatGP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since it was applied. The strong cap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formative autonomous self-studying and good man-machine interacting, at the time of providing strongly competitive auxiliary equi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lso generates potential risks for research integrity. The main integrity risks that ChatGPT possibly causes in supplemen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e information distortion, plagiarism and evil purpose of research. To avoid such risks, we must adopt ethical governance towards ChatGPT application. In applying ChatGPT, we must abide by transparency and informed principle, fair and justice principle and common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researchers, building ethical review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ng research integrity control system, can we ensure that ChatGPT, in supplemen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scientific integrity and maintain moral justice.

Key Words: ethics; govern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ChatGPT

[编辑: 胡兴华]